

《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



玄的思维陶泳玄的艺术精神

姜澄清 著 姜澄清文集·之九

《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



姜澄清 著
姜澄清文集·之九

玄的思维 陶泳玄的艺术精神

B221.5

459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 / 姜澄清著.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3.12

(姜澄清文集)

ISBN 978-7-81126-657-3

I. ①易… II. ①姜… III. ①《周易》—关系—艺术
—研究—中国 IV. ①B221.5②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1395号

《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

著 者: 姜澄清

责任编辑: 肖 敏

印 刷: 贵州创兴彩印厂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3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657-3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5981027

0746022

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

本书为2011年、2012年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



B221.5
459



再版总序

文人到辑刊“文集”的时候，大抵至末路了。而自己呢，积一生之所成，向社会奉承者，亦仅此而已；在我，实在是愧赧交加的。我一生，除教书一事，勉强及格外，他皆不足道。然教绩不能显于纸素，于是，只得将这些所谓学术成果者，付梓刊行。自己从不敢怀金针度人的奢望——本人尚且待人相度，何言度人。过而言之，这个集子不过是姑奉浅陋与糊涂于诸君。此非以谦下邀誉之术，从1957年至1978年，二十年间，在饥饿与胡斗乱争中，苟全混世，何言读书求学？自己不敢以“天也，非战之罪也”来自宽无成之憾。所聊可为慰者是，近三十年来，未敢虚掷光阴，因此有了点滴文绩。如果说，“英雄”是“时势”所“造”，那么“造”愚钝与浅薄者，孰耶？

当这个文集面世时，我已届八十，风灯雨烛，微光弱明，还能撑持几时？故在董理这些旧稿时，未尝不愀然暗伤。

我十八岁离滇客黔，一生都盘旋于山野中，其间，五十年都进退于三尺讲台。此中甘苦，非当事者莫能味。然积久成习，竟自乐于笔耘舌耕，夏则挥汗，冬则呵手，每文竟束管，仰见南窗，残月已垂，而东方已白矣。

纪文达（晓岚）晚年，以不堪考察之累，而以闲逸的“笔记”遣日自娱，到后来，连此亦厌。我正步着前贤的履辙，踏入百事皆懒执

的“无为界”。然前贤文绩煌煌，成证果而后寂，我却以果界中人的闲寂，掩己之慵懶，不亦谬乎？在古贤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我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年届八旬的人，若要疏懶，可以编出很多理由，有了理由，便可心安理得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徘徊于堕、勤之间，择其可为者为之，于是，在古稀之后，便只写随笔之类。寿多必寂，朋友间过从日少，空巢孤叟，只好将素笺当朋友，摇笔面笺，有如对友倾谈。

因此，大抵界划，七十以前，多为学术之文，此后，便是随笔之类了。

我有二十年（1958—1978）的艺术教育经历，因出身“中文系”，所攻习者，不外“之乎也者”，而置身管弦歌舞的环境中，颇有樵叟下海、渔夫入山之困。然而，成就我日后研究的，正是这困境。二十年间，耳濡目染，皆笙歌图绘，于此专业之外的纷扰，始厌之，终爱之，我不期其然而然地陶醉其中，文化视野，因之洞开。此种自然的趋进，入乎性情至深，故，后期研究艺术，实乃自然的归宿。

在此二十年间，闻睹中外艺术，而耽之愈深，愈对往昔所受之“艺术概论”教育，渐生疑意。那些“概论”，本非为艺术立言，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悟已往之不谏”，正是一种自我批判——上世纪80年代，在我，在社会，都是一个启蒙的批判时代。使我骤然名驰的文章，就是从艺术入手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由今观之，这篇指认书法为抽象符号艺术的文章，指马为马，并无绪旨，而在指驴为马的时代，平常之说，便有不平常的价值了。在刊物加按发表，并号召讨论后，一场论辩便展开了。而我，因之成为核心人物，且被尊之为“理论家”、“美学家”。这场发生于1981年的讨论，惜乎未延及哲学、文艺学，否则，所“启蒙”者，便不会仅囿于书法界了。如此的偶然，又成了自己不能不如斯以进的必然，既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欲拒不能，于是只得

顶冠而前。换言之，我是在戴上“理论家”的帽子后，才潜心致力于理论——既然难下虎背，何妨骑以驰之。新的治学道路，缘是而定。禅家曰“成佛当有立脚处”，治学亦然。我不经意撞到“立脚处”，从此，“由是而之”，从书法始，进乎绘画，因绘画之启迪，再研究华土色彩学理及中国艺术盛衰的生态原因。凡此，皆非预为设计，而系顺流趋进。有如一个泛舟随流者，我乐陶陶地漫游于中国文化的玄海中。

三十余年的研究，成绩菲微，稍可慰者，草创了书、画学的体系，亦填补了前贤研究之未及者，即本土的色彩学理。对中国艺术的“生态”因缘，亦有新锐之见。

个人所可告诸君者，仅此而已。惜乎，今者强弩之末，气衰力微，难耐寒灯冷凳之苦，更畏征引之累，老马迷途，不知所向，遂以随笔述录一时之感怀，虽曰“清谈”，实则姜（江）郎才尽，黔驴（黔固无驴，此随俗也）无技也。

《清谈录》及其续篇，是七十以后的混日之作。此时，虽于故有文献日渐疏忘，而在体验上，却优于少壮时。中国艺术，本属安静、淡远、柔婉、空寂之类，而人至桑榆之境，亦趋于此种氛致，空斋寂处，对春花秋月、丘山涧流，兀自多了相知之情。于是，便将此暮年的幽怀，随手述之，遂成就了“清谈”之“录”。也许，生活如斯，艺术也便不能不如斯了，而种种高论难免将当如是也的平常，论得离乎本相。讨论中国艺术，以得“土味”为获真。革命家“革”艺术的“命”，以使其服务于革命。于是，艺术便成了千依百顺的小女孩，任人牵引了。而洋博士呢，斥中国艺术“落后”、“不科学”，必欲使中国艺术“取西人之法”，削己足以就人履。新生代的洋博士，本疏于国学，然却大言中国书画，彼等以洋理论释土画学，术语虽同，然一经妄解，中国学问便西化了。鉴于此，我考释了画学术语，意欲正名；否则，华土理论，

形表虽“土”，却被“洋化”了。

如此这般，本土的艺术及其学理，经轮番强暴后，不复贞洁矣。我的努力，其保“贞”乎？

在咬文嚼字之暇，我也涂涂抹抹，此非欲跻身书、画界，去逐名争利，而是想假此以体验中国书画的玄机，以免门外文谈之弊。《文集》所附，即本人的涂鸦习作。丑妇见公婆，愧甚愧甚！

“新体文言”是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此亦感时而倡也。五六十年来的白话文学，颇有淡若白水之概。“白话”之兴，在实用交流方面，固为势之必然，而在文学方面，文言的美感是白话所不能取代的。毫无文言基础，而欲使白话有味，是欲赴浙而趋蜀也。古人不如今人的地方甚多，然独述文一事，今人难及。盖古人的荣辱沉浮，全系于文章。十年寒窗，诵读经史，科场成败，只定于作文。“五四”时代的硕儒通人，何以其白话文亦饶有韵致？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旧文学基础，故为文为白，皆能应付裕如。我提倡“新体文言”，是想开创一种大众皆能了然的文体，在保持文言简洁、有味的前提下，也使新体文言，明白如话。文集中辑录了我的几篇尝试之作。文学毕竟是语言之学，舍此，无论写什么，至多，也只是瓦舍唱本而已。

我的帽子不少——书论家、画论家、美学家，乃至作家、书画家。这实在是肢解了本人。还是老说法贴切，我勉强算得上个“文人”。以今义诠释，文人也者，文化人之谓也。此与古代“文德之人”、“文学之人”稍异。“文”，概指“文化”，在昔，大体指诗赋书画兼能者。此为综合之称，而这“家”、那“家”，则是分解之称。然，“文人”颇蒙揶揄，“文人相轻”、“一为文人则无足观”是古已有之的说法，我虽未染“相轻”的毛病，但确属“不足观”之类。“不足观”，谓无助于“治”、“平”，无补于生计，予每窃叹，文人之矢志“治国、平天下”者，鲜有善终——

“国”不能“治”，“天下”不能“平”，而只落得弃市长街的下场。因之，何须求“观”呢？中国文人之智者，于无奈中，遂潜身江海山林，“隐”于“文”了。由是，有了五花八门的“隐”法——初则隐于山林，继则隐于市井、隐于翰墨、隐于睡、隐于醉，乃至隐于青楼。凡此，皆“以无益之事，悦有涯之生”（陶渊明语）的自安之术。彼等所奉的箴言，只是四个字——“莫谈国事”。那么，人有唇吻，莫谈国事，又不可能哑然，于是，便滔滔以言与国事无涉者——风花雪月、诗词歌赋、酒茶丹青，如此这般，便洋洋乎造就了中国最有情趣的“隐逸文化”。谁料到呢，最“不足观”的文人却创造了颇可观的文绩。欧阳文忠公（修）曰，“晋之文章，唯‘归去来’一篇耳”，然，仅此一篇，却垂之千古，而古今来汗牛充栋的媚时之作，却只留下恶臭。中国乏抗争的文化，却多“躲”的文化，隐士便是“躲士”，这一“躲”，便陶铸出了最悠绵淡恬的文类。故，欲探宝者，当在“地下”去找——隐士即“地下工作者”也。

我一生盘旋于滇黔，然身在山野，却心系庙堂，然“天意高难测”，年轻时，总忖测“天意”的趋赴，孰料，“天”象幻变，故跟之愈紧，愈陷迷途，是以，“隐”亦不能，跟亦不能——“两间余一卒”，“彷徨”殊甚。至退休之后，世道安定，所以，“退”以“休”之。此一“退”，近乎“躲”，于是乎，“躲进小楼成一统”，只管翰墨与丹青。遂有了“清谈”之类的文事。

以上所陈，为个人的“坦白交代”，诸君在阅览我那些劣文之前，先稍知其人，或能辨弦外之音也。

姜澄清

二〇一二年桂香时

于花溪补述

序

我喜欢参加文艺界朋友的“沙龙”聚会，在那里几乎没有不谈的话题。从聂卫平胜播到弈之奥妙，从书法艺术到长寿，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得失，《金瓶梅》原本洁本的短长，歌王帕瓦罗蒂与多明戈的不同特色，京剧艺术的前途，等等。可谓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琴棋书画皆在论中。论题奇颖，谈锋犀利，时见智慧的闪光，多有真卓之识见，或是深思久酝之高论，或是偶然拾得之警策，真知与妙想杂出，幽默共机敏并现。令人兴奋、舒畅和快慰。但在这兴奋、舒畅、快慰之中，又常常感到一种不满足，那就是轻快有余而分量不足，所论奇警大胆而周密深刻不足。

我也参加一些有关文史哲方面内容的学术讲座、报告会，多是重大的严肃的命题，诸如：猿、人转化的关捩；中国古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国士大夫文人艺术的本质；中国原生观念对外来宗教的改造，等等。艺苑名流、学界硕人，或慨然论道，或轩然施讲，或侃侃而辩之，或谆谆而教之，广征博引的资料，周密翔实的考证，宏博深邃的精理，钩深取极的伟论，令人感到秘扃始启，茅塞顿开，体察世界之精微，窥见人生之奥义。真是广彼前闻，嘉惠后学，顿觉思想充实，精神振作。但在充实、振作之余，隐隐然还有一种不满足，那就是过于庄重、艰深而轻快不足，如端坐庙堂听高僧解佛经奥理，不免有重负感和枯燥感。

我想：世事多么难全，如果高头讲章与沙龙妙论结合，那么，将是怎样地引人入胜。然而，最近读了姜澄清先生的论文集稿，使我终于看到了这种文情并茂，辞理兼通，奇想与慎实相生的妙文了。

从论题和见解看，论文化本质、论名家名作、论书法、论绘画、论妇女服饰、论禅、论痴……所论不计巨细，既有庄重命题，可登高堂宏演；也有杂论琐谈，犹如沙龙妙叙，娓娓动听。而细读其文，宏章伟论，极见其深刻精博而新颖。如《阴阳观为中国的思想律》将中国古代诗词的雄健、沉郁、豪放、婉约，中国绘画之虚实、繁简、显晦、工意，书法的黑白、刚柔、巧拙等不同韵味与表现手法归之于中国阴阳观二分法的本源。《儒家的人格主义与中国艺术》则分析了文人绘画中将松竹梅兰菊石等物赋以生命人格的拟人寓意法的社会背景与意义。《论黑与白》考述了中国书法、水墨画的择色观是“知白守黑”“归于无极”的玄学思想在艺术色彩运用上的反映，等等，都是极为深刻，极具卓识的议论。而《禅趣》论超常的自我感知——禅悟在艺术创作上的作用，论文人嗜尚、论斋名别号、论文人颠痴等篇则隽思泉涌，妙趣横生，将细文作大，以琐细之论题探讨中国古代文人的特性与共性，从多侧面反映中国古文化的面貌，是以微寓著，小中见大的文章。而论指书指画，分析了这种艺术形式是艺术欣赏与创作的反常心理所产生的异流别派，又易为邀誉媚俗者所利用，誉之过当则流毒日广。这种看法道出问题的本质，是艺论中大胆而独具见解的。

在行文上，更是妙语连珠，隽言如玉，或如寒泉涌趵，汨汨不绝；或似清溪浅荡，一路潺湲；或如长河落峡，一泻千里；或似大泽巨泊，横无际涯。有时山重水复似无路，忽而峰回路转，又是一处洞天。在重大命题的演绎考证上，逐本溯源，条分缕析，务求严密精邃。而又能恢恢乎游刃有余，轻松自如，生动活泼，毫无冗繁、枯燥之感。而

杂考琐论，则幽默与诙谐迭出，奇警趣语与机敏讽谏连篇，但绝无油滑、浅薄和卖弄、寓庄严于谐语之中，风趣轻巧而含有深刻哲理。

总之，姜澄清先生的论文，以深厚的旧学修养，敏锐卓越的新观颖识，婉转自如的生花妙笔，将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贡献给广大读者，令我们看到智慧之火的炽焰，为学心力的搏动。自非墨守成说的腐儒之学和故标新异的浮夸之学可以拟比。我敢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它将引你深思，启君遐想，诱你也想一吐你的衷言，使我们的艺术理论探讨更加深化。

我与姜澄清先生是黔山辽海路八千，素昧生平，只为喜欢这些文章，竟不揣冒昧地置辟语闲言与大文之前，不免有谬托知己，唐突时彦之嫌。但拳拳之心谅作者与读者可鉴。

李仲元

一九八八年八月于沈阳故宫

再版自序

是集，初名《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集中篇什，均为上世纪 80 年代之作，1990 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重刊，删去了与其他述作雷同的两篇，其余仍原貌。

上世纪 80 年代，我个人仍难免于背着旧包袱来做新文章，此次再版，重刊旧稿，尚未发现老调重弹之弊。其中《书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艺术》一文，竟引发持续多年的论争，并被指为当代书法史之发端。这个集子，大体上匡定了我日后研究的方向与范围，《中国绘画精神体系》《中国书法思想史》《中国色彩论》即由本集中的论述所生发、扩充。

在我，治学而要摆脱“概论”教育的桎梏，殊非易事，我在读大学时，所受教育，大抵是“概”以“论”之的。以苏式之“论”来“概”华土之学，难免方枘圆凿。而我的学术启蒙，却自被视为小木末技的书法始。视书法为“抽象”，在今日，已属当然，而在 1980 年，却非小事，此一突破，在我无异是从反省中走出的新路，能“悟己往之不谏”，方能有“今是”之获。而愈往前走，愈见华土文化之明灯。由此发轫，自 80 年代中期后，不知其然而然地研究起了中国绘画、中国色彩，顺藤摸瓜，所摸者，尽是“土”货。

经汉儒、宋儒及乾嘉大儒、“五四”通人的扫荡，国学研究所未及

者，鲜矣。后愚若我者，仅能择前贤之未及者，做点“择漏”补遗的细活，而《中国色彩论》《中国人的色彩观》正是补漏之作。

前辈屡戒，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然冷板凳坐久了，难免有寒凉之感。昔称读书人曰“寒士”，说来不可思议，“士”一“热”，就好“闹”，我抗“热”力甚差，所以，躲在山里，“不见可欲，于心不乱”，奈何、奈何。

二〇一二年谨序于黔中花溪

目 录

《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 / 1

论传统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 / 17

儒家的人格主义与中国艺术 / 33

论忧患——对一个美学旧题的思考

谈禅趣 / 58

论“玄”与“闲” / 68

谈“玄览” / 76

文人嗜尚纪略 / 84

谈疯、颠、痴、狂 / 99

斋名别号杂谈 / 108

论毛泽东审美情趣的二重性 / 120

咏月诗之谜 / 130

酒与太白诗 / 148

“屈原族别属苗”疑 / 158

虾蟆、朱竹、居士——东坡其人其艺 / 168

试论《金瓶梅》 / 176

漫谈武侠小说 / 189

论黑与白——关于书法、水墨画择色的哲理依据 / 196

书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艺术 / 208

评刘著《书法美学简论》 / 218

论书法艺术美感的起源与发展 / 227

论八卦为中国书法形质之祖 / 244

指书指画盛衰史议略 / 256

错座了位置的悲剧人物——赵佶 / 260

居延汉简书法初探 / 269

论银雀山汉简的书法艺术 / 281

妇女服饰与社会变革 / 288

中国积弱成因考 / 296

后 记 / 309

再版后记 / 311

《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周振甫先生译文：人类文章的开端，起于天地未分以前的一团元气，深通这个神奇的道理，要算《易经》中的符号最早。）

《文心雕龙选译》

黄季刚先生谓自桓谭《新论》，王充《论衡》而至曹丕《典论》，陆机《文赋》，虽为论文之专著，然或“杂论篇章”、或“语或简括”，若“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刘氏《文心》一书耳”（见黄撰《文心雕龙札记》）。自李唐以后，文论之专著日多，“虽百喙争鸣，而要归无二”（同上）。“要归无二”，即同本《文心》，而归于此书大旨。乃至，直到今天，学界争为刘氏书训诂释义，俨然可成立一门专门学问，即如《红楼》之有“红学”然。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以下简称《文心》）中，自述《文心》体例是“彰乎大易之数。”其实，不仅如此，统览全书，《易》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大易之数”本《易·系》：“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文